中美在戰後世界秩序構建中的博弈與合作

梦珠生

「世界秩序」是指在任何特定時間佔主導的價值觀、規則和規範,它們界定全球管治的條件,並賦予國際社會形態和實質。縱觀歷史,世界秩序一直是由強國制訂,以符合它們特有的價值觀和基本利益,弱國只有接受的份兒;而對之不滿的新興強國就破舊立新,追求另外的一些原則,並改變或取代佔主宰地位的規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秩序由美國主導,反映美國的勢力和價值觀,有利於美國及其盟友。儘管中國也有所得益,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它成為了謀求修正現狀的國家 (revisionist power),要求更多發言權和改革一些規則,以反映其新興強國的地位。

自1945年起,美國憑藉其硬實力和軟實力,一直支撐着一個大致上開放的全球秩序。但自二十一世紀初開始,美國領導地位持續下降,中國則快速上升。特朗普(Donald J. Trump)總統因對自由主義不滿而拒絕全球化,他的孤立主義觀點和「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主張,令美國變成它自己在二戰後建立的自由秩序的挑戰者。華盛頓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巴黎氣候協定》(Paris Climate Accord),發出脱離亞洲和其他地區的錯誤信息,令世界各地民眾對特朗普及其諸多重要政策大為不滿。2017年6月26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發表一項在全球三十七個國家進行調查的結果,顯示平均只有22%的人相信特朗普會在國際事務中做正確的事,相比之下,在奧巴馬(Barack Obama)總統任期的最後幾年,對他有信心的人有64%。同時,美國的整體形象也受損。在奧巴馬擔任總統的最後歲月,平均有64%受訪者對美國持正面看法。在這項新調查中,喜歡美國的人只有49%①。

在特朗普實行孤立主義之際,中國乘虛而入,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愈來愈 重要的作用。正如一名中國學者寫道,特朗普宣布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對有志取代美國的中國來說,這不啻天賜良機」②。因此,中國問題專家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擔心「特朗普就任總統短短一段時間,就成功令中國再次強大起來。他的孤立主義言論和單邊行動,如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和TPP,令中國更容易推進它爭取全球領導地位的要求,如擔心不已的美國盟友和夥伴所說,他們對美國已不能再『完全依賴』」③。

在特朗普領導下還會發生何事,令世人矚目,人們不禁要問:美國主宰世界秩序七十年的盟主地位是否行將告終?亦即「中華治世」(Pax Sinica)是否將取代「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在現代史上,人們首次看到一個價值觀與美國及其盟友迥異的世界強國崛起。本文想要回答以下問題:中國是否想要在亞洲區內外採取強勢作為,削弱甚至取代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

本文指出,雖然中國並非滿足於維持現在秩序和安於現狀的大國(status quo power),但它也並非不滿美國領導的秩序並預備取而代之的革命型強國。特朗普的孤立主義為中國帶來機會,可趁機彌補美國抽身後在全球體系留下的缺口,但對中國來說,擔當領導角色是一大挑戰,不單因為當追隨者比當領導者容易,也因為領導能力須以硬實力和軟實力為基礎。中國不但硬實力遠遠不及美國,無法取而代之,它也無法有效運用軟實力去承擔世界秩序;沒有充分準備就去承擔起領導角色是很冒險的。中國接受《威斯特伐利亞協議》(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的國家主權原則,這是戰後秩序的基本規範,它同時順應新興的跨國規範,但中國是想要修正現狀的利益相關者,它所不滿意的並非現在秩序的原則,而是中國在此秩序中的地位。如果可以通過協商增加中國的發言權和份量,改變一些規則,藉此滿足其要求,中國或許會在改革世界秩序方面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一 作為利益相關方的中國

美國領導構建二戰後的世界秩序,其基礎是以下兩者的混合:全球化的 自由主義規範,以及《威斯特伐利亞協議》的國家主權原則。以下是三個制度 安排:

第一是《聯合國憲章》(United Nations Charter)體系,其基礎是主權原則和全球主義理想的混合。聯合國體系令《威斯特伐利亞協議》的國家主權、平等和不干涉別國內政這些核心原則持續存在,但該協議的國家主權原則,也因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奉行的集體安全體系全面限制動用武力而受到一些修正,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是世界大國,被認為有責任和能力維持世界和平與穩定。

第二是多邊自由主義經濟體系,其代表是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機構。這個體系是要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培養全球經濟合作,減少貿易壁壘。建立多邊體系,是為了取代帝國相

鬥主要原因之一的單邊主義和重商主義。資金和貨物能夠自由流動,國家就沒有理由擴張領土,因為它們的企業可以從開放自由的全球市場獲得資源。 多邊經濟體系也造就一體化的全球市場,促進經濟成長。結果,戰後時期是 財富增長驚人的時代。

第三是政治自決,包括去殖民化,以及把自治民主國家推廣為主要的全球政體。如《大西洋憲章》(The Atlantic Charter)所言,戰後體系「尊重所有民族選擇他們願意生活於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權利;他們希望看到曾經被武力剝奪其主權及自治權的民族,重新獲得主權與自治」④。民主制度被視為關乎一系列塑造國際體系的行為:減少互相戰爭、尊重法治,以及合作解決爭端。民主國家也多半會孕育蓬勃的民間組織,它們的散播跨越國界,加快了全球化進程。

在冷戰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雖被摒諸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之外,但中國在1955年舉行的萬隆會議上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以及和平共處,以此支持《威斯特伐利亞協議》準則。中國在1971年加入聯合國,開始適應全球化的自由規範;中國在1980年加入世界銀行,2000年加入IMF,它從功能性國際組織得到的益處要大於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並成為繼美國和日本之後的第三大聯合國資金貢獻國。到了二十一世紀,它在安理會中採取的立場逐漸趨於強勢。中國是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第二大資金貢獻國,僅次於美國,在每年近八十億美元的預算中負擔超過一成;中國派出參加維和行動的人數,多於安理會其他常任理事國派出人數的總和⑤。中國為維和行動這類介入性的行動出力特別值得注意,因為它長期反對「干涉」別國內政。

中國對於聯合國的貢獻愈來愈重要,顯示它作為利益相關者,對於現有世界秩序有所承擔,部分地反映它在全球化中的地位變化。由於全球化對於國家主權的衝擊程度主要視乎每個國家的國力和發展,中國相對弱小時,全球化對其國家主權的威脅就很大;中國崛起成為強國後,就可以獲取全球化帶來的利益,而不用過於擔心會喪失主權。中國地位日益重要,令它有能力而且有義務去發揮影響力。中國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國,所以現有世界秩序攸關中國的利益:「中國愈融入全球秩序,中國領導人就愈可能有理由去避免與這個秩序的衝突,因為對抗可能引起的損失,會超過可能得到的好處。」⑥

中國作為利益相關者,不但與美國合作支撐這個秩序,而且採取日益積極的措施去加強現有國際組織和多邊活動,以解決全球問題。曾經有幾十年,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中頗為冷漠的成員國,經常投棄權票。但它近年來改變了這種被動立場,在聯合國決議案中投棄權票的比例下降至只有2%,並且投票支持大部分制裁。此外,中國一般會透過全球機構去限制核武器擴散,包括參與了幾輪針對北韓核子和導彈計劃的制裁,因為中國認識到核武器擴散有違它的利益⑦。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中國曾是達成全球氣候變化協議的主要障礙之一,但後來改變態度,投入大量資源發展再生能

源。2016年,它願意簽署《巴黎氣候協定》,甚至與美國簽訂一項更為雄心勃勃的協定,顯示中國在世界秩序中的利益相關者立場。

二 對美國主導地位的不滿

然而,中國不是滿足於現有世界秩序的規則和等級制度的單純利益相關者,而是想要修正現狀的利益相關者,積極謀求重塑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在中國眼中,這個世界秩序無法滿足許多國家(包括中國)的需要和利益。中國對於美國的支配愈來愈感到難以接受,尤其不滿意自己在制訂規則和規範的地位,其挫折感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許多規則和規範是在美國主宰下創設,以符合美國對於人權、自由的價值觀,以及在民主制度中充分實現這些價值觀。中國由於政治制度不同而受排斥,並且因為不是民主國家而被西方列強視為異類。美國利用自己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導地位來謀取本國利益,並且引導發展中國家接受西方價值觀。布雷頓森林體系機構發出貸款時是可以附帶交換條件的,即實行符合貸款方偏好的自由主義改革,這一點闡明了美國如何塑造世界秩序。中國對於國家放手退場、以利西方公民社會和非政府組織壯大的想法感到不安,抗拒一個強迫它接受自由主義政治價值觀,並干涉其內政的全球秩序。它希望「與之打交道的國際秩序,是盡量簡單和低成本的,並且留下更多讓民族國家按照己意行事的餘地。中國建議,民族國家應合力減少凡事過問和野心太大的全球秩序」⑧。

中國支持這個秩序是因為它的功用,而非任何最終信念體系,因此它精挑細選要參與和反對的項目。中國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時,仍然要求兩個基本條件:行動須得到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並且獲地主國政府的同意。中國常常警告不要把人權監察制度、司法改革、警察訓練和軍隊改革,納入大規模維和任務的權責範圍之內。是否取得地主國政府同意,對於中國投票意向大有影響⑨。中國履行聯合國的法定義務,成為聯合國資金及維和經費的重要貢獻國,但在人道救援工作自願捐獻方面遠遠落後,在2016年僅向聯合國難民署捐贈微不足道的280萬美元,排名第三十九,因為「人權規範還沒有完全成為中國人的內在信念,而且如果它與主權規範相抵觸,就會有很大爭議」⑩。中國在2015年12月簽署第二十一屆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的協議時,也反對任何有法律約束力的目標和由國際監察進度。

北京擔心美國在人權和民主問題上大做文章是包藏禍心,目的是阻礙中國崛起到應有的地位,所以利用主權原則作為擋箭牌,抵擋外界批評中國內政,包括侵犯人權問題。中國同意在某些情況下,各國有責任應對人道主義災難,因為一些國際條約削弱了國家主權,例如1976年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和2005年的「保護責任」原則(R2P)。這些條約認為國家主

權須視乎該國是否履行某些義務,例如不發展大規模殺傷力武器或犯下種族滅絕的暴行,但北京高舉主權規範來抗衡國際性的保障人權命令,並限制日益受重視的R2P的應用,以減少它侵犯國家主權的可能⑪。在美國主導的秩序中,經濟發展、國際援助和合作,全都是以自由主義和民主制度的共同價值觀為前提,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AIIB)和「一帶一路」等中國倡議,是要為這種秩序提供另一選擇。

第二,中國認為現在的秩序有利於美國,而阻礙中國實現其大國夢。對於總部位於華盛頓的世界銀行,美國擁有主導的投票權,該行也一直由美國人領導。對於以菲律賓為基地的亞洲開發銀行(ADB),日本擁有主導的投票權,該行也總是由日本人領導。IMF總部在華盛頓,並由歐洲人領導。因此,中國覺得自己在全球治理中既缺乏代表權,又被邊緣化。

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具有開放和競爭性的本質,令中國得以崛起,同時侵蝕了美國的主導地位。自由貿易和資金自由流動,把財富和生產從發達國家轉移到新興經濟體。帝國式的過度擴張,例如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昂貴戰爭,加速了這種轉移。美國想要扭轉結果可謂為時已晚。美國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佔的份額,已由二戰結束時佔大約一半下降到25%;而中國所佔的份額,則從不足2%上升至約15%。隨着全球勢力分布出現根本變化,中國要求全球治理體系有所轉變,給予中國更大發言權和份量。雖然美國一向鼓勵並常常協助中國融入國際體系,但不樂見中國成為競爭對手,而只想中國乖乖接受美國的主導地位,以換取在現有秩序中佔一席位和擁有發言權。激烈的地緣政治較量妨礙改革治理結構的目標,因為美國的既得利益者和權勢人物牢牢抓住特權不放。

奥巴馬曾説:「如果我們不協助制訂貿易規則,以利我國企業和工人能在那些市場競爭,那麼中國就會訂立有利中國工人和企業的規則。」②這是美國意圖阻止中國在全球治理中與美國競爭的證據。中國對於美國長期壟斷全球經濟組織十分不滿,在2010年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上提出,應根據新興經濟體日益壯大的經濟實力,調整IMF的投票份額,藉此要求根據中國的經濟規模,提高繳付的資金份額和加大投票權。IMF因此把中國的投票份額從不足4%提高至超過6%③。這項改革得到所有其他成員國贊成,但一直毫無進展,直至2015年12月美國國會才終於批准這項改革。

部分是由於這類挫敗使然,中國在2015年6月成立亞投行。亞投行總部設於北京並由中國人領導,被視為「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發展機構的替代品,主要是因為對於已設立的機構如何運作,美國不肯讓中國有更大的發言權」(④。美國視亞投行為挑戰,勸阻盟友加入,但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澳洲和南韓等美國重要盟友相繼申請成為創會成員國,令美國措手不及。歐洲國家加入亞投行,被視為中國在重構全球治理中發揮作用的有力證明。

第三,美國在遵守國際規則和規範方面持雙重標準,令中國甚為不滿。 二戰後,美國大力制訂國際規範和規則,用來指導其他國家的行為,但自己

卻不願遵守這些用來約束他國的規範和規則⑤。美國之所以如此,是為確保自身不會受這些規則束縛,做違反其意願之事。當美國的權利受威脅,例如聲稱在南海的航行和其他行動自由受妨礙,華盛頓就會說《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的相關規定屬於習慣國際法。不過,美國國會卻從未批准該公約,而華盛頓堅持要其他國家遵守這個美國不肯接受的公約。此外,在沒有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下除了自衞不得使用武力的準則,也被美國打破。美國在1999年未得安理會授權就率領北約介入科索沃;在2003年沒有馬上受襲的威脅,又以先發制人為由,領導聯軍攻打伊拉克。中國視美國入侵伊拉克為非法、不公義和愚蠢的行動,蹂躪中東,摧毀世界秩序,並且令國際法在二十一世紀受到削弱。

美國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家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從歷史角度分析,認為美國領袖喜歡對中國指指點點,要它「維持以規則為依歸的國際秩序」,但是,比起美國在二十世紀的冒險主義,中國的行動根本算不上甚麼,當時總統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領導國勢蒸蒸日上的美國,躊躇滿志邁向他深信即將來臨的美國世紀。美國把西班牙逐出西半球;威脅與德國和英國開戰;支持哥倫比亞的叛亂,以成立新國家巴拿馬;從加拿大手上奪去阿拉斯加大部分領土;並自封為西半球的警察。羅斯福在1904年的國情諮文中宣布,美國負責維持其地緣政治相鄰地區的和平穩定,並應行使「國際警察權」。按照這種補充門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 的「羅斯福推論」,美國軍隊在往後三十年間介入拉丁美洲事務多達二十一次⑩。

三 中國的挑戰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中國積累了更大國力左右全球事務,開始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這主要集中在亞太地區。中國學者對於美國在軍事和戰略上插手亞太地區事務感到不滿,辯論中國應否像美國在十九世紀針對勢力範圍提出門羅主義那樣,採取自己的門羅主義。中國提倡設立沒有美國參與的區域安全機構,上海合作組織(上合組織)是首個由中國推動的這類組織。雖然上合組織宣稱它並非針對任何第三國,但由中國擔當領導,目的明顯是為抗衡美國在區內的影響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4年的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亞信會議)上宣布,亞洲的安全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這個鮮為人知的地區高峰會由於沒有美國及其大多數盟友、夥伴參與,多年來一直沒有甚麼作為,但習近平為它注入了活力。他依靠上合組織和亞信會議這類組織,不但能推動他的「命運共同體」構想——提出這一點是希望建立共同的亞洲身份,還能發展在北京與華府關係以外的重要外交關係。

同時,中國推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這是由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十國發起的自由貿易協定,並得到澳洲、中國、印度、日本、

南韓和紐西蘭六國參加,與美國領導的TPP分庭抗禮。特朗普決定美國退出TPP,令RCEP的吸引力大增。一項東盟所做的調查顯示,雖然69.8%的受訪者認為,如有美國參與,東南亞會更穩定,但比起特朗普執政之前,現在美國被視為不是那麼可靠的盟友:54.3%的受訪者認為,不能依賴美國捍衞區內的自由貿易、人權和國際法;超過一半人也覺得特朗普當選總統後,華盛頓已失去戰略優勢⑪。

習近平要求展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並且拿出中國方案、顯示中國智慧和發出中國聲音,藉以強調中國對全球治理的貢獻,作為其民族復興論述的中心元素。中國媒體尤其大張旗鼓報導習近平拿出「中國方案」的呼籲。2013年以來提出的、至今已耗資逾千億美元的「一帶一路」以及亞投行倡議,就是中國的方案,顯示中國在制訂地區貿易和投資架構的規則方面,擁有規範性的力量。習近平希望利用中國的財富去創造新型的全球化,改變西方主導的機構的規則,藉此重塑全球秩序,把其他國家更緊密地拉進中國的勢力範圍。

習近平在2013年宣布「一帶一路」計劃,依靠基礎建設、貿易和經濟發展,加強中國與世界的聯繫,藉此作為實現中國大國夢的宏偉戰略。「一帶」是由陸路連結中國與中亞、南亞、俄羅斯和歐洲,「一路」則把中國沿海地區聯繫到東南亞和南亞、南太平洋、中東和東非。總加起來,「一帶一路」計劃涵蓋世界大部分人口、GDP和國際貿易。雖然「一帶一路」還在醞釀成形之中,但它雄心勃勃的目標,顯然是要建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由非西方國家組成的洲際網絡。如一位西方學者指出,「一帶一路」旨在聯繫中國陸地和海上邊界以外的六十五國共四十四億人,藉以重塑世界很大一部分地區的秩序,並把中國置於其中心⑩。也有中國學者認為,亞投行是中國的創新之舉,為中國提供參與國際規則構建的機會。雖然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為解決全球重大問題有所貢獻,但當前這輛「舊車」已顯疲態,亟須改革,而美國遲遲不肯落實改革承諾,引發眾怨。中國發起亞投行,能夠緩解現有體系中的矛盾,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參與制訂國際規則⑩。

改革全球治理成為中國的熱門話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15至2016年兩次舉辦以全球治理為主題的集體學習。習近平在第一次集體學習中說,中國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目的是要在國際競爭中奪取制高點。他的外交政策副手傳瑩進一步解釋,中國要求改進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是因為「經過超過三十年的快速成長,中國許多人了解到這個國家是全球變革的推動力之一,而且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愈來愈大」⑩。秉持這種信念的習近平說:「國際社會期待聽到中國的聲音、看到中國的方案,中國不能缺席。」⑪他在第二次的政治局集體學習中提出,中國須加強四個方面的能力:規則制訂、議程設置、輿論宣傳和統籌協調②。

趁着特朗普背棄全球化和卸下全球領導角色,中國領導人強調他們會為國際事務負責以及發揮中國式治理方法的優勢。習近平在2017年1月出席於

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以〈共擔時代責任 共促全球發展〉為題發言,發言重點不是中國國內經濟這個中國領導人喜歡在外國談論又鮮有爭議的題目,反之,他表達了中國要引領全球化的雄心。一個月後,習近平在北京召開的國家安全會議上公開承諾,中國要引導國際社會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並引導國際社會共同維護國際安全。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網站上有一篇評論文章認為,習近平的「兩個引導」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和G20外長會分別召開之際提出的,其意頗深。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正走向終結,西方國家干預世界事務的意願和能力都在下降,特朗普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就是明證②。

以往中國只是表示它有意參與構建世界秩序,如一位中國學者所言:「在過去,習近平僅要求中國參與創造新的世界秩序,或者領導新的經濟全球化。習近平要求中國領導改進世界秩序,是對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中的領導角色的一個重大超越。」這種變化不只象徵中國愈來愈有信心用其提出的方式來改善全球治理,也顯示中國已準備就緒,要把國內和世界事務整合到協同行動或互利共存的新形式②。在習近平提出這種呼籲後,《人民日報》一篇文章説:「中國已具備成為全球化引領者的意願、能力和機會……正經歷從全球化受益者到全球化貢獻者和引領者的轉變。」③

四 還沒準備好取代美國領導的秩序

在一些觀察家眼中,中國的言論顯示北京嘗試實現它的願望和爭取利益,並且試圖削弱甚至取代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有西方觀察家警告「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之間的碰撞」,是衝突即將來臨的前奏,擔憂中美兩國的競爭愈來愈激烈,會令全球體系無法維持下去⑩。新加坡學者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預計中國將會得勝,預示美國世紀的終結和亞洲世紀的來臨⑪。然而,中國還沒準備好取代美國領導的秩序:

第一,全球領導地位代價不菲,需要強大資源來提供公共產品。以硬實力提供公共產品,需要有遠大眼光,不能只局限於短期的自我利益,而要負擔金融、經濟、軍事和政治成本,中國在這方面還遠遠比不上美國。雖然中國現在是對外援助的淨捐助國,但它的捐助水平還遠不及許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中國甚至沒有類似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那樣的專職發展援助機構,可以協調發展援助。它的新倡議沒有在其崛起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這些倡議只是崛起的後果。

雖然曾有人聲稱美國國勢已頹,所以二戰後建立的世界秩序也日薄崦嵫,但這些人最後全都收回預測。現在説美國的國家安全政策會走向抽身而退仍為時太早,因為有很強大的抵消力量存在——當中最大的是,現在全球化無遠弗屆,美國企業已與全球價值鏈深入交織在一起。美國生產者和消費

者會因國內保護主義和其他國家的報復而受害;美國行政部門、國會和全美各地都有經濟自由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會抗衡支持特朗普的孤立主義者和保護主義者;美國憲法和這個國家充滿活力的開放社會,也能加以制衡。此外,國外也有強大的抵消力量,因為美國繼續大力參與亞洲事務,是許多國家人民得享更自由繁榮生活的關鍵。美國仍然是全球秩序的中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國家」②。

雖然特朗普在總統競選活動和就職演說中承諾「美國優先」,令華盛頓疏遠傳統盟友,並且卸下全球大管家的角色,但他對世界的看法在進入橢圓形辦公室以後就會不一樣,因為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的總統,他必須負起非履行不可的責任。美國仍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無法規避以軍事和經濟實力為盟友提供公共產品和安全保障的責任。特朗普必須適應現實,因為美國國家利益繼續存在。

相比之下,中國是脆弱的新興強國,在國內面臨可能導致其崛起失敗的嚴重困難。經濟放緩對中國領導人造成巨大壓力,環境破壞、貪污腐敗、貧富差距擴大、地方政府負債纍纍,都成為愈來愈嚴重的問題。中國窮人的不滿和忿恨,可能聯合起來構成對政權合法性的挑戰。由於政權穩定受到嚴重挑戰,自保、穩定和經濟繼續成長,就成為它的主要關注。中國領導人深知對中國的威脅源自內部多於外部,誠如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指出,中國崛起成敗與否,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國內威脅,而非外部因素。最危險的國內挑戰是極左路線和「假大空」,導致中國提出超越國力的國際承諾和戰略目標②。受到愈來愈艱鉅的國內問題所困擾,中國領導人很難調動充足資源和內部支持去擔當全球領導的角色。

第二,具備全球領導地位的大國需要遠見、創造力、毅力、靈活的外交手腕,以及其他軟實力要素,要引導其他國家願意讓渡本國的狹隘利益,配合國際社會的重大利益,甚至有時讓本國利益退居次席。中國大力投資發展軟實力,在全球開設超過五百所孔子學院,還開展大規模的國際形象行銷活動。但是,中國遠未達到能取代美國的程度,也無法提出能令別國認同並渴望分享的價值觀和理想,藉以有效地運用其軟實力。美國的領導地位源於亞洲各國自願追隨,並與之組成同盟網絡,另外還來自其歷史孕育的其他聯繫——它首先把亞洲從戰爭中解救出來,後來又推動亞洲經濟成長和保障其安全。美國領導地位也來自信任。儘管許多亞洲國家與華盛頓有分歧,很多時候不滿意其政策,但它們還是相信美國多於相信其他國家。

支撐美國全球支配地位的屬性,中國盡付闕如。一位學者承認,中國或許有朝一日在綜合國力上會超越美國,但很難在全球影響力方面超過它⑩。另一位學者指出中國在話語權形成方面面臨的困境:中國在歷史上從未領導世界,相對於《威斯特伐利亞協議》的國家主權原則,傳統的華夏體系只是東亞的層級體系,缺乏普世性,不能自動轉化為現代話語權。中國在國際話語權的缺失,是令世界其他民族無法接受中國特色話語的主要障礙⑩。

北京過於依賴經濟力量為主要外交工具,顯示它缺乏可靠的規範性和戰略力量去塑造地區秩序。北京至今主要依賴經濟外交,利用貿易和經濟聯繫來加強與鄰邦和其他國家的政治和戰略關係。但是,在國際關係中金錢買不到忠誠。影響力不是只來自國家的金庫,而是來自共同價值觀的建立和軟實力的提升。中國能否實現其戰略目標,主要取決於它是否有能力為鄰邦及其他國家提供共同價值觀,令彼此有志一同。

第三,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是多極體系,而不是中國在亞太區稱霸。中國的大國夢受到美國、日本和其他地區大國的存在和影響力所掣肘。中國崛起之際,許多周邊國家也在勃興,它們顯然不樂見這個地區出現「中華治世」。中國從主張和平崛起,變為採取更強勢的作為,令鄰國緊張起來。為了制衡中國,許多國家再次倒向美國和互相結盟②。縱觀歷史,向崛起中的國家靠攏是普遍做法,因為這樣做可能獲得巨大的相對利益。最成功的新興強國,正是那些能吸引大量追隨者的國家③。但中國不具備塑造和影響國際政治規範所需的軟實力,也沒有足夠的戰略能力去可靠地保障區內安全。與多個鄰國同時陷入緊張關係,不符合中國利益。如果中國無法贏得鄰國支持,或至少先發制人,打消它們制衡中國的動機,就無法成功崛起。

儘管特朗普命令美國退出TPP,「為中國送上大禮,令它可以取代美國在亞洲的角色」愈,但中國能否發揮美國的作用,制訂地區機構的規則,還是未知之數。華盛頓退出TPP後,東盟發起但由北京主導的RCEP或許更有可能開花結果。不過,TPP的所有成員國都同意遵守大致相同的標準和規則,RCEP則不同,它的目標是以零敲碎打、逐項處理的方式,讓成員國能靈活選擇它們想要參與的承擔。RCEP的成員國極為多元化,發展程度不一,令設定談判議程的工作更為複雜。例如,日本和南韓希望制訂嚴格規則保護知識產權,但印度擔心這會妨礙其非專利藥產業的發展,遂領導較貧窮國家反對日、韓的要求。由於印度對中國有疑慮,並長期抗拒貿易自由化,RCEP力求不致淪為一紙膚淺的協議。此外,政治因素也令RCEP蒙上陰影。如前所述,亞洲大部分地區都有相互嫉妒的國家在競爭,許多夥伴之間有歷史恩怨,又互相猜

疑。美國長期建立的同盟和它發揮保障地區安全的作用,能夠彌合諸多分歧,勸使爭吵不斷和桀驁不馴的亞洲國家同意TPP。但是,現時美國的亞洲政策不明朗,舊恨積怨可能再次爆發,包括猜疑北京的意圖,並預料中國想利用RCEP來奪取特朗普似乎一心想要放棄的美國地區領導地位圖。

因此,中國仍然是利益相關者,無法背離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正如一位評論者所說,由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創造的國際秩序的規則,中國雖然沒有參與制訂,但中國利用國際體系增進自己利益,並防止主權受外界侵犯,是美國領導成立的國際體系中最大和最成功的搭便車者⑩。作為「開放貿易國際秩序的重要受益方,中國不覺得有必要挑戰國際經濟秩序的基本規則」⑩。此外,中國「不想領導現有的全球體系,遑論為了管理世界而創造新的體系,並承擔全部費用」,因為「中國一向和以後行事都會是為了自己最佳的國家利益。它的世界觀與中華帝國的文化根源一致——把蠻夷擋在門外,而不是侵略他們」⑪。

中國身為現有世界秩序的受益者,習近平矢言「要堅定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維護和鞏固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成果」⑩。傅瑩解釋説:「中國既無意圖也沒能力推翻現有秩序。」⑩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中國承諾會繼續履行《巴黎氣候協定》,而在特朗普提出「美國優先」的反全球化議程時,中國又答應會與各國合作處理全球治理的難題,顯示它的利益相關者立場。

不過,如前所述,中國是一個想修正現狀的利益相關者。修正型國家可分為三種不同層次:第一種是革命修正型國家,希望同時改變規則和地位等級;第二種是激進修正型國家,致力改變規則,但主要在國際社會的原有架構內進行;第三種是正統修正型國家,對於規則大致上並無不滿,但希望在分配地位方面能有所改變④。中國是正統修正型國家,它不是一味反對原有秩序,而是積極加強和重塑它的元素,以提高中國作為規則制訂者的地位,擴大它在這個層級中的影響力。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都主要是默默遵循規則的國家,其指導方針是「『最大最小原則』——享有最大權利,承擔最小義務」⑩。美國長期呼籲中國擔當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要它為全球公共產品貢獻更多。雖然中國在運用日益強大的力量來追求其核心利益方面愈來愈強勢,但對於要求它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呼籲,中國沒有作出相應的承擔,反而大多專注於追求頗為狹隘的本國利益。

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能再一如既往地搭便車,而須在全球治理中承擔更多國際責任⑩。因此,中國要在國際體系中「創造性介入」,並提出新的倡議,例如主要國家關係的新模式、新東亞秩序、「一帶一路」、「命運共同體」等⑪。中國倡議這些新計劃,是表明它會承擔責任,而不是一種特權宣示,更不是要取代現有秩序。這些新倡議能賦予中國這個謀求修正現狀的大國更大影響力,但它們會像從前那些旨在改革全球體系的倡議一樣,要麼慢慢湮沒無聞,要麼被併入現有體系。

五 結語:中美合作重塑世界秩序

當北京更深入參與地區和全球秩序,並擁有更大的能力後,勢必會嘗試改變某些界定戰後秩序的權力關係。但中國對於現有的規則大多遵循,它致力於改革而非重寫這些規範和原則。中美之間的分歧主要並不在規則本身,而在於中國這個崛起中的大國,在制訂規則方面是否獲得與其自身情況相稱的聲望和地位。

由於中國的要求只是新的權力分配,而不是要取代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基本規則,美國或許可以與中國談判,改革全球治理的結構。畢竟,在美國佔全球GDP一半時看似天經地義的戰後秩序已不可持續,因為美國現在只佔25%左右。這種發展並不表示美國人擁有的絕對權力會變少,但它表示以美國佔絕對優勢為前提的機構和行為模式必須調整,以把其他國家的興起考慮在內。「它們〔中國〕希望在國際體系中有發言權,是合情合理的要求,滿足這種要求並不是軟弱或綏靖,而是保持國際秩序穩定和維持美國影響力所必需的。」圖「崛起的中國願意承擔更大的全球責任和領導角色,國際社會對之應當歡迎。」圖

前美國副總統拜登(Joe Biden)形容美國樂見「負責任的競爭對手」,並強調中美夥伴關係必須遵守「共同的規則,無論新舊」,他還說:「中美有責任合作,共同塑造這些新規則。」⑩作為回應,傅瑩呼籲中美兩國合作「創造一種新的『秩序』概念,這種概念要能兼容並包,並能照顧所有國家的利益和關注,為各方搭建一個共同的屋頂」⑩。美國致力利用其與盟友建立的組織、準則和規章來盡量滿足中國的改革要求,令中國對它在現有秩序中的地位感到滿意,這樣做符合美國的利益。中國的國家利益深深嵌入多邊機構的網絡之中,這或許會令它在運用日益增長的實力時,與世界秩序的和平轉變相一致。

與此同時,中國也需要經歷一個學習過程。雖然中華文明出現經世濟民思想的時間,與西方古代大思想家所處的時代大致相同,但中國對於現代國家外交的經驗有限。在歷史上大多數時期,中國要麼是宰制鄰邦的帝國,要麼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受害者,被列強欺侮。然而,現代的治國之道不同以前,國家可以參與國際體系,根據其他國家的利益來調整自己的利益以達成目標:妥協遷就的過程使國家在堅持自己立場的同時,不致對其他國家的利益造成不可接受的損害,或動搖國際體系愈。因此,倘若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沒有凌駕於理性之上,那麼改革世界秩序成功與否,就主要取決於中國這個謀求修正現狀的利益相關者的學習過程;此外,還取決於美國在執行規則的同時,能否通過談判滿足中國在參與制訂規則方面的要求,增加中國話語權和份量,並調整部分規則。如果中美兩國攜手合作,雙方就能在和平塑造世界秩序過程中,共同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註釋

- ① Jacob Poushter and Kristen Bialik, "Around the World, Favorability of the U.S. and Confidence in Its President Decline", 26 June 2017, www.pewresearch. org/fact-tank/2017/06/26/around-the-world-favorability-of-u-s-and-confidence-in-its-president-decline/.
- ② 黎蝸藤:〈中國應積極填補美國的領袖空缺〉(2017年6月14日), FT中文網, 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2983#ccode=iosaction。
- ③ David Shambaugh, "China Rethinks Its Global Role in the Age of Trump", 14 June 2017, www.bloomberg.com/view/articles/2017-06-13/china-rethinks-its-global-role-in-the-age-of-trump.
- The Atlantic Charter, 14 August 1941, www.britannia.com/history/docs/atlantic.html.
- © Colum Lynch, "China Eyes Ending Western Grip on Top U.N. Jobs with Greater Control over Blue Helmets", 2 October 2016, http://foreignpolicy.com/2016/10/02/china-eyes-ending-western-grip-on-top-u-n-jobs-with-greater-control-over-blue-helmets/?utm_source=Sailthru&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New%20Campaign&utm_term=%2ASituation%20Report.
- ® Nicholas Taylor, "China as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Power? Implications for Australia", *Security Challenges* 3, no. 1 (2007), www.securitychallenges. org.au/ArticlePDFs/vol3no1Taylor.pdf.
- © Leif-Eric Easley and In Young Park, "China's Norms in Its Near Abroad: Understanding Beijing's North Korea Poli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 no. 101 (2016): 651-68.
- ® François Godement, "Expanded Ambitions, Shrinking Achievements: How China Sees the Global Order", 9 March 2017, www.ecfr.eu/publications/summary/ expanded_ambitions_shrinking_achievements_how_china_sees_the_global_order.
- Stefan Stähle, "China's Shifting Attitude toward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5 (September 2008): 631-55, https://doi.org/10.1017/S0305741008000805.
- [®] Jing Chen, "Explaining the Change in China's Attitude toward UN Peace-keeping: A Norm Chang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8, no. 58 (2009): 168.
- ① Zheng Chen, "China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 no. 101 (2016): 686-700.
- [®] Justin Sink and Carter Dougherty, "Obama Warns China Will Fill Void If Trade Authority Fails", 18 April 2015, www.bloomberg.com/politics/articles/2015-04-17/obama-warns-china-will-fill-void-if-u-s-can-t-reach-trade-deals.
- [®] "IMF Reforms: China, India, Brazil, Russia Get Greater Say", *The BRICS Post*, 28 January 2016, http://thebricspost.com/imf-reforms-china-india-brazil-russia-get-greater-say/#.Wnn5QbeWyUk.
- ② Zachary Karabell, "Lead, America, or Get Out of the World's Way", *Politico*, 1 April 2015, 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5/04/jacob-lew-china-trade-policy-american-downfall-116585.html?ml=m_t2_2h#.VR0-h7rF_ww.
- ⑤ Stewart Patrick, "World Order: What, Exactly, are the Rul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9, no. 1 (2016): 18.
- [®] Graham Allison, "China's Maritime Provocations are Nothing Next to America's Adventurism a Century ago", *The World Post*, 25 July 2017, 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south-china-sea-america_us_5975f525e4b09e5f6cd0b1fd?qwf.
- ① "ISEAS Poll Shows Low Trust of China in the Region", 4 May 2017, www. todayonline.com/chinaindia/china/trust-lacking-china-would-be-reponsible-

regional-leader-survey; June T. Dreyer, "ASEAN Summit's China Tilt Portends a New World Order", 16 May 2017, 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ent/asean-summits-china-tilt-portends-new-world-order.

- [®] Jacob Stokes, "China's Road Rules: Beijing Looks West toward Eurasian Integration", *Foreign Affairs*, 19 April 2015, 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3709/jacob-stokes/chinas-road-rules.
- ⑩ 王義桅:〈中美就「一帶一路」開展合作是否可能?〉、《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7年第8期,頁44-50:〈亞投行選對了方向走對了路〉(2017年7月20日)、人民網、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7/0720/c1003-29416099.html: 陳曉晨:〈亞投行不應被視為「一帶一路」的籌碼〉(2015年7月7日)、鉅亨網、https://news.cnyes.com/news/id/593877。
- © Fu Ying, "Under the Same Roof: China's View of Global Order", *The World Post*, 11 November 2015, www.huffingtonpost.com/fu-ying/china-global-order_b_8537918.html?utm_hp_ref=world.
-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2016 New Year Message", 31 December 2015, www.fmprc.gov.cn/mfa_eng/wjdt_665385/zyjh_665391/t1331985.shtml.
- ❷ 習近平:〈加強合作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 共同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崇高 事業〉(2016年9月28日),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9/ 28/c_1119641652.htm。
- ◎ 〈習近平首提「兩個引導」有深意〉(2017年2月21日),中國幹部學習網, www.ccln.gov.cn/hotnews/230779.shtml。
- Wenshan Jia, "China: Shifting from a Participant to a Leader of the New World Order", 1 March 2017, http://chinaplus.cri.cn/opinion/opedblog/23/20170301/871.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 ◎ 〈中國具備全球化引領者的意願、能力和機會──世界讚賞中國的全方位開放〉、《人民日報》、2017年3月16日、第3版。
- ® Philip Stephens, "China's Rise Confounds a Splintered West", *Financial Times*, 26 March 2015, www.ft.com/content/9759a714-d2fe-11e4-b7a8-00144 feab7de.
- ® Kishore Mahbubani, "Why Britain Joining China-Led Bank is a Sign of American Decline", 16 March 2015, www.huffingtonpost.com/kishore-mahbubani/britain-china-bank-america-decline_b_6877942.html.
- ® Razeen Sally, "Asia Still Needs America: Neither China Nor Europe Can Take over Leadership on Global Issues", *Nikkei Asian Review*, 22 May 2017, http://asia.nikkei.com/Viewpoints/Razeen-Sally/Asia-still-needs-America.
- ◎ 閻學通:〈政治領導與大國崛起安全〉,《國際安全研究》,2016年第4期, 頁17。
- ◎ 薛力:〈中國崛起的標誌是綜合國力而不是影響力〉(2015年7月31日),薛力的博客,http://xueli.blog.caixin.com/archives/116322。
- ① 王義桅:〈打造國際話語體系的困境與路徑〉(2015年8月4日),愛思想網, www.aisixiang.com/data/91024.html。
- Suisheng Zhao and Xiong Qi, "Hedging and Geostrategic Balance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toward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 no. 100 (2016): 485-99.
- Randall L. Schweller, "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ed. Alastair I.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London: Routledge, 1999), 10.
- Philip Bowring, "China's Delusions of Regional Hegemony", Financial Times,
 August 2015, www.ft.com/intl/cms/s/0/b8b90350-3f46-11e5-b98b-87c7270
 955cf.html?siteedition=intl#axzz3iTRPbCpz.

® Robert A. Manning, "China and the US-Japan Alliance", 28 October 2013, www.eastasiaforum.org/2013/10/28/china-and-the-us-japan-alliance/.

- ® Zha Daojiong, "China Must See Past Its Own Hype of an America in Declin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8 June 2014, www.scmp.com/comment/article/1535623/china-must-see-past-its-own-hype-america-decline?page=all.
- Ashish Kumar Sen, "Mr. Trump, Don't Pull Out of the TPP", Atlantic Council Report, 22 November 2016, 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mr-trump-don-t-pull-out-of-the-tpp.
- Guy de Jonquieres, "Trump's TPP Rejection Does Not Make China the Natural Heir", Nikkei Asian Review, 25 November 2016, http://asia.nikkei.com/ Viewpoints/Viewpoints/Guy-de-Jonquieres-Trump-s-TPP-rejection-does-not-make-China-the-natural-heir?page=1.
- Shiping Tang, "Liberal America, Illiberal China, and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10 May 2016, chinaus-icas.org/materials/liberal-america-illiberal-china-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
- ⑩ 習近平:〈推動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2015年10月13日),新華網,www.xinhuanet.com/2015-10/13/c_1116812159.htm。
-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Colchester: ECPR Press, 2007), 237-46.
- ® Elizabeth Economy,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making: Broadening Perspectives and Policies ... But Only to a Point", in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 ed. David M. Lampt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32.
- ® 賈慶國:〈全球經濟從「西方治理」走向「東西共治」〉(2016年9月2日),參考消息網,http://ihl.cankaoxiaoxi.com/2016/0902/1290082.shtml。
- ⑩ 王逸舟:〈取得新成就的中國外交該如何轉型〉(2016年3月2日),環球網, 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6-03/8634463.html。
- ® David M. Lampton, "A Tipping Point in U.S.-China Relations is Upon Us", 11 May 2015, www.uscnpm.org/blog/2015/05/11/a-tipping-point-in-u-s-china-relations-is-upon-us-part-i/#_ftnref5.
- "The U.S.-China Strategic & Economic Dialogue/Consultation on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23 June 2015,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5/06/244120.htm.
- ⑤ Fu Ying, "What are the U.S. and China Fighting Over?", 1 September 2016, www.bloomberg.com/view/articles/2016-09-01/what-are-the-u-s-and-china-fighting-over.
- ® Franklin L. Lavin, "Thinking Seriously about China", 7 July 2016, www.heritage. org/research/reports/2016/07/thinking-seriously-about-china.

林立偉 譯

趙穗生 美國丹佛大學約瑟夫·克貝爾國際研究學院中美合作中心主任兼教授, 《當代中國》(*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主編。